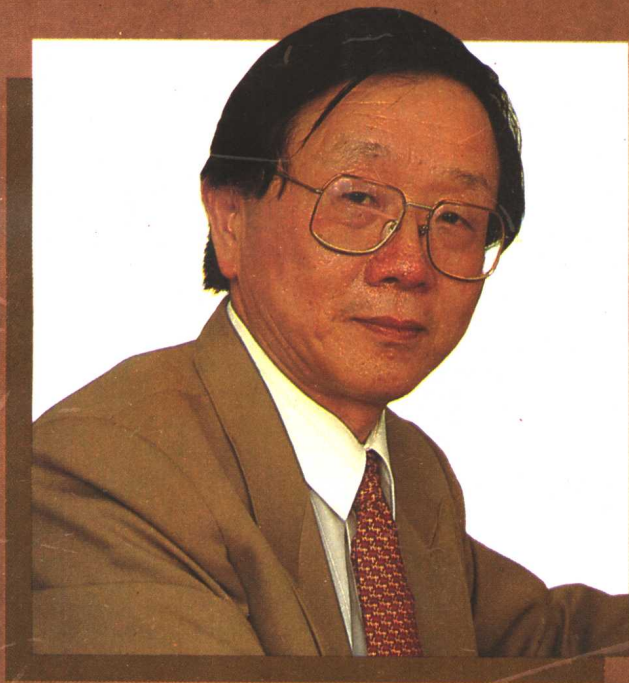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声剑中匣

刘吉著





中國創業

第一輯



匣中剑声

刘吉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名人日记
1994

(沪)新登字 101 号

责任编辑 金永华

封面装帧 陆震伟

名人日记 1994

匣中剑声

刘吉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4 字数 112,000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0,001—20,000

ISBN 7-208-01954-1/G·269

定价 8.10 元

作者简介

刘吉,安徽安庆人,1935年生,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研究员。兼任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东方研究院院长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上海分院院长。原来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转向社会科学研究。他的研究密切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,研究领域比较广泛,主要有科学学、领导科学、经济发展战略和科学社会主义。与有关同志合作著有《软科学》、《科学学基础》、《领导科学基础》、《现代化与中国》、《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引论》、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》等十多部专著,并在国内外杂志发表《现代管理基本原理》、《现代领导艺术》、《什么是社会主义》等论文一百多篇,是我国软科学、科学学、领导科学的开拓者之一。

自序

日记，理应日日记。但，我不。

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不愿(至少暂时不愿)与人言而又必须倾诉的东西，这就是我的日记——纯粹是内心的独白。我从中学就开始记日记，记下我青年时代多少喜怒哀乐、思考与趣事！可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看到许多日记被抄出，作为“黑帮”的罪行，我不得不偷偷在一个下午躲在宿舍里忍痛付之一炬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逃不过那场浩劫。我的一位挚友保存了我写给他的几百封信，被造反派抄出，成为“反革命小集团”首恶分子滔天罪行的罪证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不再记日记，写信也只是报个平安，不谈思想了。

十几年来，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，心有余悸慢慢消失了，但青年时代的激情也渐渐消失了，也就再没有决心重记日记了。然而，知识分子“恶习”难改，何处独白？于是随手记在工作手册中，自命什么“随想录”“火花集”之类，还有即兴写在单页纸上放入专项卷宗内……心想，留作退休后再慢慢整理和回味吧。从未想到出版的事。

我从来不赞成活着出版日记之举。

既是内心的独白，何以向人展示？

既是内心的独白，多是即兴记录，思考不成熟，有的甚至以后也自我否定。发表出来，不仅违反“良工不示人以朴”的古训，而且在当今棍子专家尚未绝种的现实下，岂不正好授人以柄吗？

至于为了自我显耀而制造日记，就更令人厌恶了。

但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陈昕同志说服了我。他要求我绝对真实地记录和展示自己，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理论工作者是如何生活和思考的？好在，我的“日记”中绝大多数都是理论思考，没有什么不可展示于人的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思考，很不成熟，甚至也不具有学术形态。准确地说，只是提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。虽然自己也屡想深入研究一番，无奈各种行政事务缠身，没有时间也无法专心致志地进行。这是一种唯有自知的痛苦。何不借此机会展示出来，和读者们共同思考，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吧。

1月1日 星期六

春天是陶醉的季节，
夏天是火热的季节，
秋天是思念的季节，
冬天是回忆和做梦的季节。

过去一年饱含着赤诚的爱，
让赤诚的爱拥抱着新的一年。

1月3日 星期一

中央已决定财税体制、金融体制、汇率并轨等五项重大改革同时出台。消息传来，十分兴奋，几乎成了这几天理论界朋友们见面必谈的话题。这五大改革实行，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基本框架。这是喊了多年终于出台的深化改革。十几年来改革基本上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外，发展一块市场经济。它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，同时也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巨大冲击。功不可没。可是，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毕竟是体制外改革。传统计划经济虽受冲击有所变化，但没有伤筋损骨，基本框

架依然用这样或那样形式顽强地保存着。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,才是进入了体制内的改革,现在五大改革出台,真正向传统计划经济动大手术了。成败在此一举。

兴奋之余,大家都有一个疑问:它真能成功吗?

要成功,改革必须按最小阻力原则推进。这无疑是有道理的。可是不改革的阻力最小最小,等于零,最小阻力原则也有可能導致改革在改革的口号中消亡。因此,改革必须还有一个最大效益原则,争取最大效益。如果以最小阻力取得最大效益,那是最理想的改革,但是现实往往恰是效益与阻力成正比,为争取最大效益必须克服最大阻力,这也许是小平同志把这场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原因之一吧。

既是革命,就必然有革命对象、革命动力、革命道路、革命方法等一系列问题。毛主席曾经一针见血地写道: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这场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,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,当然没有敌友问题。但也有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。从而,也就应该有改革的阻力与动力。阻力来自何方?来自传统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。传统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是哪些呢?主要有三:

(1)直接贯彻计划经济的政府官员;

(2)吃“大锅饭”的职工;

(3)长期享有“一平二调”利益的落后地区。

我决无意说这三部分不拥护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改革,他们也对这场改革怀有巨大的期望,他们也投入了这场改革。但是一旦动真格改到自己头上,潜在的利益机制就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自觉不自觉地发挥起作用。人人都赞成打破“大锅饭”,可是一旦拉开分配、优化组合,尤其是被优化组合下了岗的,抵触情绪就油然而生。难就难在这场改革要通过他们去贯彻。难还难在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,不是敌人。是敌人可以采取简单剥夺就解决了,是同志只能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和尽可能共享改革的效益。

怎么办?

没有什么捷径,关键是提高大家革命的自觉性。

目标是坚定的,道路是曲折的,步子要踏实,革命一定得胜利。

1月10日 星期一

今年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是控制在一位数以内,但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相信。群众怀念毛主席时期物价稳定。必须对通货膨胀问题有一个全面概念。

通货膨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,影响因

素很多。在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主要标志是物价增长率，它正比于货币数量增长率。但在中国，特别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，情况就要复杂得多。不能简单从物价单一指标来判断。

从根本上讲，由于人民需求不断变化、日益增长，而影响供给的因素又十分繁杂，供求完全平衡是不可能的，从而物价平稳不变是不可能的。总的趋势是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。特别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或经济改革时期是不可避免的。

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，可以有三种基本类型的通货膨胀：

1. 隐性通货膨胀

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一方面是生产无法灵活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，另方面是平均主义分配导致“冲击性需求”。从而必然是“短缺经济”，供不应求，通货膨胀是这个机制的必然产物。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强制物价不变，并用发放各种票证来限制人民的需求和消费。所以，从表象看似没有通货膨胀，实际上是强行隐藏在经济生活之中。

隐性通货膨胀下，虽然物价平稳，但是以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和经济发展缓慢为代价，这当然不是良策。它已为过去痛苦的实践证明了。

2. 恶性通货膨胀

可以用三个指标的关系来表达：

物价增长 $>$ 人民收入增长 $>$ 生产增长

人民收入增长大于生产增长，必然供不应求，物价增长；物价增长大于人民收入的增长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，……构成了恶性循环。这种恶性通货膨胀，如不及时医治，必然导致政治危机和社会不稳定。这是十分危险的。

3. 正常通货膨胀

表征这种通货膨胀的三个指标关系如下：

物价增长 $<$ 人民收入增长 $<$ 生产增长

此时虽然物价上涨表明通货膨胀，但人民生活不降低，生产和经济仍然发展，所以是正常的。人民与社会都能承受这种物价上涨，不会产生什么危机。

从这一年多来的统计资料分析，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属于正常通货膨胀。但是，正常通货膨胀也需要进一步分析。

虽属正常通货膨胀，但也有不同情况，可以定性两种情况：(1)低膨胀。例如物价上涨10%以下，越小越好。这是真正的正常情况，是经济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。(2)高膨胀。例如物价上涨10%以上，继续上涨，难免有一天打破正常通货膨胀的三个指标相对平衡，从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。因此，必须提高警惕。

追求低膨胀，抑制高膨胀，关键在于“生产增长”

指标。“生产增长”要进一步分析。它可以包括三个增长因素：基础设施增长、基础工业增长和消费品工业增长。最直接与人民生活相关的、与人民最直接感受的通货膨胀有关的，是消费品工业增长。

当这三项生产增长基本协调发展，就达到低膨胀。

如果基础设施、基础工业增长过小，最后势必制约消费品增长，破坏低膨胀，逐步走向高膨胀。或者反过来，消费品工业增长过快，势必促使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短缺涨价，也破坏低膨胀。

如果基础设施、基础工业增长过大，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。首先，占用大量资金，从而抑制消费品生产；第二，带来原材料以及消费品成本增长；第三，增大消费资金等等。特别是这类增长的效益回收期长，上述种种后果有着积累作用。于是迅速导致高膨胀。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“投资饥饿症”及其后果。现在我们遇到的正是这种高膨胀。

对策：急则治标，用行政手段迅速控制基本建设规模；求因治本，深化改革、政企分开，加快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。

我不知道西方经济学通货膨胀标准理论究竟是什么。看了两本，知道影响因素不少，但似乎难得要领。一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说，当年我们高通货膨胀怎么突然发生，至今也说不清楚，后来慢慢低下来

了,是综合因素,也不知哪个因素起了主导作用。这倒是诚实的科学态度。说明这是一门大学问,值得认真研究。我写以上这些更是肤浅了,又算得了什么!就算是刘吉的土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的第一次思考吧。哈哈。

1月12日 星期三

中国改革确是到了关键时刻。在改革中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要解决。读了报刊上一些经济学家和领导人的讲话,我总感到不在点子上。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,或者一时用高压的行政手段解决了,过后又死灰复燃,就是明证。这几天我系统地思考了一下,深深感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:中国许多经济现象是中国特有的。有些经济现象虽是世界共同的,但其原因是完全不同于西方,也是中国特有的。要解决中国特有的经济问题,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,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,从而找到正确对策。西方经济学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手段,西方专家的观点也可以兼听,但是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,我看是不可能的。赵紫阳同志一个重大失误恐怕就是专听洋人、听那些在西方得了博士而

对中国实际一窍不通的年轻“智囊”们的话所致。不妨看一个实例，即困扰中央的打“白条”、“绿条”问题。

一些省市农村出现打“白条”、“绿条”，甚至银行因为无业务停止办公，造成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强烈的不满，一时形成十分严重的不安定因素。虽然中央三令五申，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解决。

要求因治本。因不明，仅用行政命令办法是解决不了打“白条”问题的。

一个直接的被广泛宣传和接受的解释是：钱是专款下达的，但被挪作其它用途了。例如钱被拿去搞开发区等基本建设投资去了，结果向农民收购棉粮只有打“白条”了。猛一听，颇有道理，但仔细一想，出现了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疑问：钱不管挪作什么他用，去基建，去买原材料，去发工资等，但钞票是不会留在单位、商店和个人手中的，顶多留一天两天又会存到银行里去的。只要钞票在银行，银行有现钞，何至于打“白条”呢？既然基本建设投资急用时可以挪用农业经费，那么农业收购急用时自可再挪回来嘛！把挪回来的钱支付了农民，第二天农民又会储入银行，无非是挪来挪去，“白条”何来之有？这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学知识，只要生活的逻辑就可解决。可见原因不在于此。

实际情况是银行里确实没有可供支付的现钞！

是钞票太少？可是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却一直在增加，而且数量是以百亿、千亿计算的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，随着经济高速发展，人民生活提高，本身要求更多的货币流通，而我们增加的货币发行量还不够，所以银行里无现钞，只能打“白条”。可是，现在已经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了，货币投放似乎已经过多了。因此，还必须另找原因。

挪用农业经费去搞基本建设的事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常有的事，何以过去没有出现打“白条”，而现在是一年甚于一年呢？看来必须从这几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中去找原因，必须从某种潜在的利益机制中找原因。

一个原因是银行和邮局的不正之风，为了自己单位的福利把钱压在自己手中，自己搞“三产”，或借贷给愿出高利息的企业。老实的农民好欺侮，打“白条”！

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量人民币在银行之外进行“体外循环”，这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。

由于数以万计的个体、私营、乡镇和三资企业崛起，他们为了偷税，越来越多地进行现钞交易，而不通过银行支付。这种“偷税病”如今甚至已经传染到国有企业了。

君不见报纸上电视上不断有这样的报道：一些供销人员或个体户遗失的提包内有几万几十万元，

一些“雷锋”们拾金不昧又归还了他们。人们看了十分惊诧和感动，可是人们为什么不追问一句：他们随身带这样巨额现金干什么？

在一些地区（例如苏南），一张百元大钞可以掉换 11 张十元人民币，以便携带方便。

他们为什么不存银行，宁可不要利息（银行利息是否太低？）而直接现钞交易？为什么宁肯损失 10% 的利益去换百元大钞？因为不通过银行，就无据可查，就可以偷税，偷税的利益远远大于银行利息的损失，大于换钞的 10% 损失。现钞交易还可以增加小金库，乃至回扣贿赂交易。个人与企业得利！

可是，国家损失了数以百亿计的税收，而银行却因为缺少现钞，只得打“白条”。

全部问题症结在此。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有论述吗？

解决的办法就是对症下药。首先是立法，用重罚杜绝金融“体外循环”。同时推广信用卡制度，用科学办法防止“体外循环”和在途现金。

药方好开，疗效难讲，因为中国缺乏法治传统，农民根本没有经济法规的概念，有法不依，法不治众，这又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了。还得从中国实际出发去解决。

中国的事，难哪！